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351頁。

這是一部相當生動、饒富趣味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口述史。本書的主人翁為邢肅芝，1916年出生於南京，9歲皈依佛門，16歲進入四川重慶漢藏教理院學習西藏語文，同時擔任當時中國佛學會會長太虛大師的秘書。1937年獲得國民政府有關漢藏交流計劃的公費補助，前往西藏，修習藏傳佛教密宗，經過7年的刻苦學習，於1944年底通過辨經考試，而根據作者本人的說法，他成了第一位取得藏傳佛教黃教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的中國內地漢人。在取得格西學位後，邢肅芝回到他求學時的重慶，入世參政，除接受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任命為「專門委員」之外，也被教育部委任為國民政府所設立之拉薩小學校長。1949年夏，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遭到西藏當局的驅逐，邢肅芝也跟隨駐藏漢人官員撤離拉薩，1950年移居香港，1959年，應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邀請赴美國講授藏學，並定居美國至今。

本書的第一、二章主要回憶主人翁早年在中國內地的生活與求學經歷。他幼年曾先後在江蘇鎮江、南京、杭州等地的寺院接受佛教教育；1932年，當時在中國內地活動的九世班禪喇嘛前來杭州傳法，法名「碧松」的邢肅芝，因而有幸初次接觸藏傳佛教，並對其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兩年後，他隻身前往四川重慶的漢藏教理院，研修藏語並擔任藏文經典的翻譯工作，並得以親近當時在中國佛教界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太虛大師。在重慶經過3年的修習之後，邢肅芝決定進一步前往西藏求法，本書第三、四、五章即在記述他於1937年，不辭艱辛，由四川走陸路經西康進入西藏的詳細經過。在拉薩，邢肅芝取藏名為洛桑珍珠，進入了西藏傳統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攻讀藏傳佛教格西學位，本書第六章描述主人翁作為漢人喇嘛，在拉薩寺院求學與生活的種種描述。而身為來自中國內地的漢人，邢肅芝在修習藏傳佛法之餘，亦不忘關心當時的漢藏互動關係，在第七章裡，作者不但詳細介紹了民國時期西藏地方政府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情形，同時亦大量述及當時國民政府駐在拉薩的機構與其成員，並且對於當時漢藏之間的政治交流，做出相當細微的觀察與批評。在西藏求學之餘，邢肅芝亦曾數次前往拉薩以外的地區，進行旅遊與考察，本書第八、九章主要記述他前往山南地區的咱日山朝聖經過，以及前往傳統上由班禪喇嘛所管轄之後藏地區進行訪問考察的情形。1944年底，邢肅芝通過了嚴格的格西辨經，取得了藏傳佛教黃教的拉然巴格

西學位。然而一個有趣的轉折是，在學業有成回到四川重慶後，邢肅芝決定還俗、從政、結婚，他除了接受蒙藏委員會的官職之外，亦接受教育部的任命，返回拉薩擔任由國民政府所支持籌辦的「國立拉薩小學」校長一職。本書第十章即對此一轉折與經過，做一說明。邢肅芝偕夫人在拉薩待到1949年夏天，當時西藏地方政府以「驅逐共產黨份子」為藉口，決心遣送國民政府駐在拉薩的所有相關人員與眷屬，在這章中，邢肅芝亦提到他如何運用以往在拉薩豐沛的人脈與管道，在此一「驅漢」事件上起了一個關鍵作用，使全體在藏漢人官員與眷屬，最後得以平安離開西藏。

本書自2003年問世以來，以主人翁本身極為獨特的多重身份（漢僧、喇嘛、政府官員、駐藏校長），以及描述其親身經歷之諸多精彩而豐富的故事內容，已廣獲各方相當大的迴響與好評。誠然，此口述史雖是邢肅芝本人在20世紀上半葉的個人生命歷程與心路之旅，但其內容同時又是一份映照出民國時期西南地方社會與宗教、漢藏關係、民俗等等諸多風貌的第一手觀察報告。本口述史裡不僅充份展現出當時西藏政教合一體制、漢藏政治與宗教交流等許多重要議題，更為難得的，是口述者在西南中國與西藏所目睹的感性事件與身歷之日常生活種種描述，譬如西藏百姓上下的日常生活與飲食習性、西藏貴族聽留聲機與打麻將的嗜好、藏傳佛教寺院僧侶們的衣食住行與三大寺裡求學過程的點點滴滴、藏地的郵差與販賣陶器的商人等等，這類隨處可見的風俗人情細節，配合着書中大量由主人翁當年所親自拍攝的一幅幅極為珍貴的照片，已不是吾人閱讀一般相關歷史教材或官方檔案文件所可以獲得的社會生活細節。此口述史雖不敢說已完整呈現出民國時期中國西南地區與西藏社會的全景，但無庸置疑地，此一作品將使吾人能夠更真切地感受到距離中國內地權力核心、受遙遠時空所阻隔的西藏。

然而從更嚴謹的學術角度觀之，任何口述史都無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而口述內容之真實程度與可靠性，也容易為人們所質疑，特別是史述中所呈現的諸多觀點，究竟是當時事件的再展現，抑或只是口述者本人，甚至是「筆述者」的主觀看法，往往有待商榷，僅舉書中幾處為例，稍加說明。本書第三章提及西康大金寺的戰火發生的原因以及漢藏代表談判解決此一糾紛，指出1931年秋，大金寺喇嘛與白里土司爭奪寺產，互相廝殺，大金寺喇嘛仗着人多勢眾，又有西藏地方政府的背後撐腰，以武力攻擊白里，最後進一步擴大成爲一場西藏軍隊與國民政府中央之間的戰爭，最後藏軍被劉文輝的二十四軍打得潰不成軍，西藏地方政府因而決定和解，最終國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以金沙江爲界，在崗拖簽訂停戰協訂（頁85-86、95-96）。然而

回顧歷史，在1930年代康藏邊界發生戰事之際，南京的國民政府對於川康軍閥劉文輝，事實上並無真正有效的影響力，此一衝突，與其說是「國民政府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戰事，不如說是川康軍閥劉文輝與藏方之間，為爭奪地方與寺院資源所造成的衝突；而且最近的研究更指出，南京國民政府自始至終從末能夠插手主導此一邊事，甚至連最後停戰協訂的簽定，事前都毫不知情而必須在事後被動地加以承認這一協訂的有效性。【參見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頁105-141。】邢肅芝當時曾親身經歷西南川康地區的生活與考察，又見證了劉文輝的代表與藏方在崗拖談判並簽署協訂，不可能沒有察覺到當時西南中國微妙的政治局勢。有關此一事件的敘述，吾人看來，似乎更類似當今中國近代漢藏關係史學界對於此一議題的「標準答案」，因而讓讀者不得不懷疑這到底是口述者本人的真正看法，或是兩位筆述者的補充說明意見？類似此種民國時期漢藏關係史上「政治正確」的描述，也在本書中其他地方可見，細心的讀者，並不難加以細察。

此外，在第十章有關拉薩小學的敘述方面，口述者指出當時有許多國民政府特務，以在小學擔任教職為掩護，在西藏境內從事諸多特務工作，其本人則強調，他當時曾極力向國民政府要求擁有學校人事權，其目的即在於不希望讓學校成爲一個特務的據點（頁322）。不過當今文史資料與解密檔案卻指出，縱使口述者本人不願多加承認，然而他當時在校長任內的作爲，事實上即被視爲是在替國民政府進行最重要的特務工作。【見常希武，〈國民黨特工人員在西藏〉，《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88），頁52-58。】現今臺北國史館所藏《國民政府檔案》裡，亦度藏一份由國民政府軍務局所保存的〈碧松和尚呈一年來西藏政局概況〉，內容即爲口述者以拉薩小學校長的身份，向國府最高當局報告當時西藏內部政治的種種情勢，以及二次大戰後中國特務人員在西藏的地下工作狀況。邢肅芝同時也在此份機密報告裡，向國民政府提出警告，當時在藏的中國特工人員派系林立，相互鬥爭嚴重，必須加以妥善處理，否則遲早將受到西藏政府的打壓；此外，他也在報告中提出，國民政府方面應設法補救漢藏之間當時不斷衰退的經貿連結，以挽回西藏民心。【見〈碧松和尚呈一年來西藏政局概況〉，1946年12月30日，《國民政府檔案》，〈西藏政情〉，419/0141-419/0163。】

另就整體內容與架構觀之，本書在時間上只截止於1949年夏天在拉薩所發生的驅逐漢人事件，此後半世紀，口述者從西藏經印度輾轉來香港再到美

國的經歷，以及舊年知交的滄桑命運變遷，只在後記的〈曲終人散以後〉匆匆帶過。筆者的一個看法是，若能夠將其在香港與美國生活的種種值得憶述的經歷亦以專章說明，相信必定使整部口述史更加完備生動。

儘管有如上一些仍待進一步釐清並且須小心以對之處，這仍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且極具學術參考價值的口述史，特別是本書大量的細節記述，除了足以彌補相關領域主流歷史論述的不足之外，亦將對近代漢藏關係史與中國西南地區的社會、人類、宗教與民俗等各學科領域，以及理解民國時期漢藏的政治互動與族群關係，提供吾人珍貴的第一手訊息。

林孝庭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 By YINONG X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xi, 361pp.**

築有城牆的中國古代城市因其形制和布局的獨特性，引發了建築史、歷史城市地理諸領域學者對於探討古代城市建造中所謂「宇宙觀」傳統的濃厚興趣，許多城市史研究者更是對城市營造制度和布局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給予了關注，其中以對「中世城市革命」的討論最為著名。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有學者力圖更深入地從建築形態變遷的角度，探尋政治沿革、經濟發展和文化觀念演進的空間印跡，他們沒有把傳統中國城市作為城牆內孤立的個體加以對待，而是將其置於區域社會史的視野下，從而拓展了對城市發展特質的理解。這或許是當前城市史研究亟須着力的方向之一。在此意義上，姑且不論《時空下的中國城市：蘇州城市形態的發展》以兩個半世紀的蘇州城市建築史作為其考察對象是否過於寬泛，僅僅由於該書對上述問題作了探索的緣故，已經足以彰顯它的學術價值。

本書作者許亦農先後在清華大學和愛丁堡大學獲建築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現任新南威爾士大學高級講師。該書基於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全書除導論和結論共有七章。第一章概述了蘇州城市在特定的地理環境、文化和政治條件下逐步興起發展的過程及其在地區中的地位變化。作者既看到社會風俗的延續性，也敘及帝制時期歷次政權更迭和人口遷移造成的文化嬗變。在追溯西元前六世紀末城市早期建造情形的第二章中，限於考古資料的匱乏，